

缕一方，墨书汉、满、蒙、藏四体文字题识，内容相同，标名不同悬挂方位。如松赞干布像汉文为：

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，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番画像达赖喇嘛源流一轴。番称达赖喇嘛那穆塔呼，清称达赖喇嘛达塞秦，蒙古称达赖喇嘛尹查第克。右二。

章嘉胡土克图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藏传佛教领袖、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。清宫所藏唐卡，按产地可分为“京画”，即北京地区匠师绘画；“番画”，即西藏地区匠师绘画。题识说明此像是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三月初六日经章嘉确认进奉皇宫的，虽未说明绘画的创作时间，但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可靠线索。

从这组唐卡的题识所注方位与画面人物姿态可知，它们是以七世达赖像为中心的。七世达赖为中年形象，正襟危坐，其余各像分列左右，姿态为左右侧身像，倾向七世达赖。（见下表），七世达赖法名格桑嘉措，西康理塘人，生于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年），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年）12岁时由康熙帝册封为达赖，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20岁时拜五世班禅为师，受比丘戒。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，藏历火牛年）二月三日圆寂，时年50岁。朝廷得知报告，钦命三世章嘉入藏办理善后事宜，寻访认定转世灵童。章嘉于同年十二月到达拉萨，在藏居住3年，于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回北京复命，这组唐卡于次年三月初六日奉献宫廷。对此《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》有生动细致的记载：

具有无边大慈悲的章嘉国师回到都城北京，在朝见文殊大皇帝时，大皇帝亲自走出寝宫院门迎接，一见章嘉国师，马上以满族的礼节亲切接待，行抱见之礼，互致问好，献上洁白的长哈达，并说：“诸事圆满完成，一路平安归来，与朕相聚，朕不胜欢快。”他们进入寝殿，坐在同一个座垫上，详细谈论西藏的情形。大皇帝高兴地接受了章嘉国师从西藏带来的佛像、唐卡、香料、毡毯等大量礼物……

这组内容丰富、笔墨精密的唐卡，短时间不可能画成，再加上章嘉从西藏至京的路途时间，可以肯定其绘制时间的下限在1760年；再从

七世达赖的中年形象上，又可断定此像的上限不会早于他20岁受比丘戒的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。这样，其绘画的时间段大体可定在1727—1760年。

七世达赖在位期间，正当西藏政局混乱的多事之秋。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，准噶尔蒙古军队入侵西藏，杀拉藏汗，祸乱西藏，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。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，七世达赖由清军护送进藏坐床。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西藏贵族之间争权夺利发生武装冲突，酿成阿尔布巴事件，清政府再次发兵进藏平乱。为防止准噶尔蒙古再次侵藏，危害达赖，雍正帝下令将七世达赖自拉萨移至西康噶达地方惠远庙，直至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）才返回拉萨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，主持藏政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叛乱，七世达赖即命公班智达代理藏王，捕获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，平息叛乱。为整顿西藏政局，清政府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制定了“酌定西藏善后章程”13条，下令由七世达赖掌管西藏地方政权，他时年44岁。从这时至其圆寂的6年，应当说是他一生事业的鼎盛期。这13幅唐卡虽名为达赖源流，而众星捧月般崇奉的却是七世达赖。回顾其一生，历经政局动荡的少年、青年时代是不大可能享此殊荣的。依此推断，这组唐卡的创作时间应在1751—1760年。

西藏唐卡因佛教内容神圣，不能有画家题记，所以确定其准确年代相当困难。清宫唐卡因缝有白绫签，写明时间、进贡人及画的名称，所以是研究唐卡艺术的宝贵财富。达赖喇嘛源流唐卡，清宫收藏有多套，其中另外一幅松赞干布像的白绫题记为：“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，钦命章嘉胡土克图认看供奉利益画像达赖喇嘛……”画面内容与前一幅完全一样，只是设色浓淡和装衬的锦缎不同。笔者在西藏文管会、扎什伦布寺都见过同样内容的松赞干布像及达赖源流中的其他像，杜齐《西藏画卷》中也有同样一幅松赞干布像，可见这是18世纪中期在西藏流传广泛的一套唐卡组画。它是用内容相同的木刻版刷印出底线，然后填色绘制而成。而清宫收藏的达赖喇嘛源流唐卡组画，保存完好如新，且有准确可靠的题记，可视为18世纪中期西藏唐卡艺术的标准画幅。

（作者：故宫博物院馆员）

